

组态视角下营商环境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基于 fsQCA 方法

周杭 杨静* 周立军 韦笑

(中国计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 营商环境作为一项软制度,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其各类要素如何组合来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是个有待研究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组态和系统两大视角,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全国36个城市作为样本,探究其复杂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组合路径存在3条,即人力-金融主导型、人力-投资主导型和资源-政务主导型;导致城市低质量发展的路径存在4条,路径结果存在显著的因果非对称性。研究结论揭示了营商环境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城市发展道路的选择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 营商环境, 城市发展, 高质量, 组态, QCA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4-5698.2023.07.003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Promoting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Based on fsQCA Method

ZHOU Hang YANG Jing* ZHOU Li-jun WEI Xi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soft system,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urban development, but how to combine its various elements to enable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s a realistic problem to be studied. Based on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configuration and system, this paper uses th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complex causal mechanism of 36 cities in China.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are three combination paths for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promote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namely, human-finance oriented, human-investment oriented and resource-government oriented, there are four paths leading to the low-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path results have significant causal asymmetry.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urban development,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hoice of urban development path and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Keywords: business environment, urban development, high quality, configuration, QCA

基金项目: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优化及助推创新发展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20BGL016)资助。

作者简介: 周杭,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营商环境、创新管理。

杨静, 通信作者,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营商环境、标准化、创新管理。

周立军,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标准化战略、标准化治理。

韦笑,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营商环境政策、标准化。

0 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深,其发展环境也日益复杂且内涵更加丰富,需要从原来追求数量的扩张转变至追求质量的提升,聚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然而,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营商环境做支撑。营商环境作为一项制度环境,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途径。2020年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显示,我国营商环境的全球排位从2017年的78位提升至2019年的31位,是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全球各个国家对营商环境均非常重视,自2006年以来,全球各个国家根据评价指标进行了多达2783项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措施。

2019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从制度层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依靠营商环境来激发城市的创造力和市场活力,让软环境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柱。2021年10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的工作意见,旨在提高城市的政府治理效率、市场活跃度以及发展质量。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持续优化城市营商环境则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各城市间在经济发展、市场环境、创新环境等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所以探索差异化的营商环境优化路径以及形成与城市发展的最佳匹配则尤其重要。因此,厘清营商环境与城市发展间的复杂关系,从组态视角探索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组合,为我国城市提供新的发展思路进而提高发展质量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2001年世界银行提出“营商环境”概念,持续推进市场准入改革,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发展^[1]。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在准

入、生产经营、退出等过程中涉及的全部外部条件总和。同年,世界银行成立Doing Business小组,负责构建营商环境评价体系^[2]。目前,其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已发展至对全球190个经济体进行全面评估和排名,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绩效评价指标之一^[3]。营商环境的建设例如:通过电子政务来简化申办流程^[4]、改善金融市场来保障资金支持等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企业开办或者运营过程中的阻碍,并且对创新创业活动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5]。

营商环境作为一项制度环境,能综合反映出城市的思想解放程度、市场完善水准、对外开放水平、综合竞争实力以及未来发展潜力,对于一个城市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6]。便利的营商环境被认为是国家社会经济财富的指标之一,城市GDP的增长与营商环境存在高度的相关性^[7-8],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作用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9-10],同时通过相关营商环境政策的出台可以加快城市产业的改革与进步,助推城市发展进程^[11]。

另外,城市若要突破发展旧格局并且加快开放创新,就需要营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发展规划和提升自身潜力^[12-13]。同时,许多城市的政策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只有通过建设一流的营商环境来吸引全球高端要素,才能抢占新一轮的发展先机^[14]。因此,营商环境的改革顺应了城市发展的新逻辑,是全力提高城市发展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节点^[15],更是推动城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16]。

综上,从现有文献来看,虽然存在许多有关城市营商环境的研究,但大多立足于城市自身的角度来探讨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构建以及营商环境改革、优化的措施,而缺乏通过整体视角反向思考什么样的营商环境才能推动城市发展质量的提高。

2 研究设计

在新发展格局下,城市开始重视提升发展质量,但因其起点和环境的差异,需要充分考虑自身

条件以及所处背景,站在科学合理的角度来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并且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调整,从而产生不同的发展道路^[17]。本文旨在探究营商环境要素对城市发展质量造成影响的可能性路径,而营商环境由不同要素组成并且城市发展也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因此两者间的关系多重且复杂,需要通过组态的视角对其整体进行研究。

2.1 结果变量

在国内外诸多因素共同影响下,中国在新阶段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这一要求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等特点,需要通过多维度衡量城市发展质量^[18]。基于高质量发展理念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本文从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5个维度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19-23]。创新已经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对于城市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24-25]。协调体现区域内动态发展机制,高协调水平对于城市协同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至关重要^[26]。开放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下的必经之路,只有持续深化改革开放,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国际合作才能推动城市综合发展^[27]。共享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其发展质量高低与否最终还是需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来衡量^[28]。因此本文从上述5个维度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2 条件变量

城市营商环境水平同样需要从多层面衡量,本文参考世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以及李志军学者的《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将人力资源、基础资源、金融服务、投资环境、政务环境作为营商环境条件要素。

2.2.1 人力资源

在企业全生命周期中,劳动力作为一种要素直接投入到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并且能促进企业内部其他资源的有机整合^[29]。同时,高素质的劳动力是企业达到高水平管理和高效益产出的关键因素^[30],是市场竞争中的一项巨大优势。另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不仅营造了良好的创业氛围,也为营商环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人力保障^[31]。

2.2.2 基础资源

资源是企业经营生产所依赖的基本物质条件,如:区域内水、电、气、土地等资源的供应,是企业切切实实能够感受到的“硬环境”^[32]。相关资源配置关乎到企业的交易性成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生产经营效率^[33]。一个地区拥有较高的资源供给能力,有利于企业扩张,同时也会吸引更多外来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强度^[34]。

2.2.3 金融服务

金融市场是企业重要的外部经营环境之一,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导致企业往往会面临融资约束和信贷压力,使得企业筹措资金相对困难,而资金是企业的“血液”,最终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生产活动。地区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缓解信贷歧视等问题,为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进而增强企业的发展信心^[35],激发其研发创新活动^[36]。

2.2.4 投资环境

投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者行为,关系到企业的落地生根与发展。便利的投资环境,有利于迅速吸纳更多资金,推动资本的生存和增值,形成良性循环^[37]。同时,优秀的投资市场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且还可以让企业在获得资金支持的基础上得到相应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从而影响其运营方式和决策深度,进一步推动企业的发展和创新^[38]。

2.2.5 政务环境

政务服务是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其反映了地方政府服务效率和监管协调能力,能够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发展。合理的政府管制能够维护市场秩序,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39],从而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另外,良好的政务服务会促进政商关系规范化,减少政府寻租、受贿等行为,有利于降低企业创办的制度性成本,为企业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40]。

2.3 组态模型

针对前文提到的营商环境5个要素,目前许多文献只局限于研究单个要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而并没有探索这5个要素如何组合起来系统地影响城市的发展质量。综上,本文基于组态的分析视角主

要解决两个因果问题：(1) 是否存在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要营商环境要素？(2) 营商环境要素之间如何耦合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的组态框架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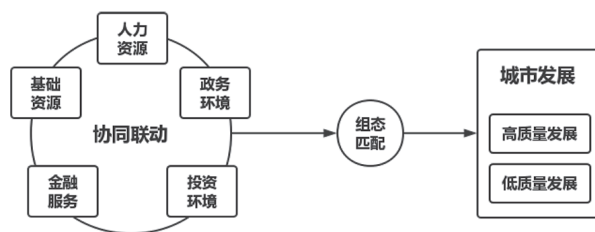


图1 组态模型

2.4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CA)是20世纪80年代由拉金(Charles C.Ragin)提出的一种案例研究分析方法^[41]。与传统方法不同的是, QCA跳出了回归分析中“平均化净效应”的局限以及相关关系的因果逻辑缺陷, 根据“组态”与“集合”两大视角, 在案例基础上通过布尔代数^[42], 实现不同个案间的分析比较, 从而发现系统间的相似点与差异^[43], 立足于整体来探寻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问题^[44]。在实际案例中, 由于特征值在不同个案中的差别往往是连续的, 若采用二分变量来刻画这些特征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 本文采用fsQCA方法, 通过建立模糊集形成真值表来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构型分析。

2.5 研究样本

QCA方法适用于中小样本案例分析, 针对全国范围内34个省份行政区和5个计划单列市, 再考虑到相关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 剔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案例, 最终选择36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

2.6 变量测度

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以及共享5个指标来衡量城市的发展质量。同时, 营商环境选择了人力资源、基础资源、金融服务、投资环境、政务环境5个要素作为条件变量, 具体指标测度见表1。数据来源于《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以及

EPSDATA各数据库。

表1 各变量指标测度

变量	指标	测度	来源
发展质量	创新	人均专利申请数(件)	中国城市数据库
		人均专利授权数(件)	
		R&D内部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	
		R&D人员比例(%)	
	协调	人均GDP(万元)	中国城市数据库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总产值比例(%)	
		人均财政收入(万元)	
	绿色	单位产值工业废气排放量(吨)	中国城市数据库
		单位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吨)	
		单位产值工业烟尘排放量(吨)	
		污水集中处理率(%)	
	开放	外商投资企业数(个)	中国城市数据库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总产值比例(%)	
	共享	城市道路长度(公里)	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中国城市数据库
		人均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人)	
		人均医生数(人)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户)	
营商环境	人力资源	职工平均工资(元)	中国城市数据库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万人)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万人)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
	基础资源	销售气量(万立方米)	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
		生产运营用水(万立方米)	
	金融服务	工业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中国城市数据库
		工业用电(万千瓦时)	
		金融业从业人员数(万人)	中国城市数据库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万元)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万元)	
	投资环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个)	中国城市数据库
		本年应交增值税(万元)	
		货物进出口额(万元)	
	政务环境	一般预算内支出(万元)	《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
		政商关系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校准

3.1.1 计算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权重与得分

用熵值法确定各个指标及其构成要素的权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赋值或者均化思想的缺陷^[45]。本文运用熵值法来计算城市发展质量和营商环境各个指标要素的权重，进而得到较为客观的指标得分。

3.1.2 校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为模糊集

由于营商环境和城市发展二者的分数高低划分目前缺乏一定的理论标准，因此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对5个前因条件变量和1个结果变量进行校准，把各变量的25%、50%、75%分别作为完全不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隶属点的锚点。城市低质量发展则通过取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非”集实现。各变量校准点见表2。

表2 变量校准锚点

变量	完全不隶属点	交叉点	完全隶属点
城市发展	29.99	34.94	44.22
人力资源	20.21	24.85	40.78
基础资源	11.25	15.60	29.30
金融服务	7.75	11.53	21.19
投资环境	5.14	12.71	24.87
政务环境	26.10	35.45	46.31

3.2 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组态分析前，应检验是否存在必要的前因条件。所谓必要条件，就是在某特定结果出现时该条件必然存在。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将0.9的一致性阈值作为必要条件的判别标准^[46]。必要性分析结果见表3，可见各项前因条件对解释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低质量发展的一致性均未达到0.9，因此不存在必要条件。另外也可以说明，城市发展是一个复杂系统，若只通过单一要素来解释并不现实，需要通过组态的视角来探究其复杂因果影响机制。

3.3 组态分析

导致结果变量产生的不同条件变量组合称为条件组态^[47]。解释结果的一种常用方法是通过中间解来确定组态的数量和条件，然后利用简约解来确定给定组态较为重要的核心条件。出现在简约解中

的条件被称为给定组态的核心条件，表明与结果之间存在较强的因果关系。而出现在中间解中但没有出现在简约解中的其余条件则称为边缘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较弱。本文将原始一致性值设定为0.8，PRI一致性值设定为0.7，案例频数的门槛设定为1，参考已有研究的表述方式，表4呈现了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以及低质量发展的组态分析结果。

表3 必要条件分析

条件变量	高质量城市发展		低质量城市发展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人力资源	0.806111	0.855543	0.249444	0.264741
~ 人力资源	0.307222	0.290441	0.863889	0.816702
基础资源	0.771111	0.788189	0.330556	0.337876
~ 基础资源	0.352222	0.344753	0.792778	0.775965
金融服务	0.842778	0.832601	0.302778	0.299122
~ 金融服务	0.290556	0.294151	0.830556	0.840832
投资环境	0.838889	0.832414	0.297778	0.295480
~ 投资环境	0.290000	0.292273	0.831111	0.837626
政务环境	0.743889	0.753093	0.326667	0.330709
~ 政务环境	0.338889	0.334797	0.756111	0.746981

表4 组态分析

条件变量	高质量城市发展			低质量城市发展			
	H1	H2	H3	L1a	L1b	L2a	L2b
人力资源	●	●			⊗	⊗	⊗
基础资源	●	⊗	●	⊗	⊗	⊗	●
金融服务	●		●	⊗	⊗	⊗	●
投资环境		●	●	⊗		⊗	⊗
政务环境		●	●	⊗	⊗		⊗
一致性	0.89	0.95	0.88	0.94	0.95	0.95	0.92
原始覆盖率	0.63	0.20	0.54	0.61	0.68	0.61	0.23
唯一覆盖率	0.12	0.13	0.04	0.02	0.02	0.09	0.03
总体一致性	0.89			0.91			
总体覆盖率	0.80			0.75			

注：(1) ●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2)在高质量城市发展的标准分析时，选择“人力资源*金融服务”以及“基础资源*政务环境”作为质蕴涵项。

3.3.1 人力-金融主导型

路径H1指出，高人力资源和高金融服务作为核心条件，辅以高基础资源作为边缘条件的组态可以产生城市高质量发展。该组态表明，一些基础资源供给相对充足的城市，政府可以通过培养劳动力市场以及改善金融环境来进一步助推城市发展质量的提高。如图2(a)所示，处于此类营商环境生态的典型城市包括上海、广州、北京等。以上海为例，作为

中国沿海最为发达的城市,其是全国最大的港口、贸易、科技、金融、信息中心之一,拥有充分的资源供给;在此基础上,上海发布了一系列促进就业发展的政策,例如:在2019年上海人才引进政策中进一步放宽了人才落户条件,同时上海市政府支持浦东国际人才港建设,充分发挥其高能级人才服务综合体和人力资源配置枢纽的作用;另外,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等,享有十分优质的金融基础。在上述条件的共同影响下,上海的发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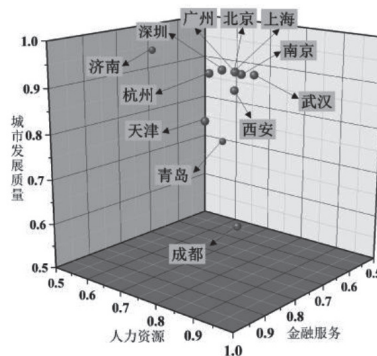
3.3.2 人力-投资主导型

路径H2指出,高人力资源和高投资环境作为核心条件,辅以低基础资源和高政务环境作为边缘条件的组态可以产生城市高质量发展。该组态表明,一些基础资源供给不足的城市,政府可以通过人力市场、投资环境以及政务服务3个方面的协同改善从而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如图2(b)所示,处于此类营商环境生态的典型城市包括郑州、长沙、合肥等。以郑州为例,根据《郑州市投资环境研究报告2019》显示,在人口红利逐渐褪去的后工业化时期,郑州劳动力市场优势依然明显;其次,郑州拥有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国家政治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等,具有十分良好的投资载体和投资环境;同时,郑州市于2019年正式运行市政务服务办事大厅,为群众提供“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一站式”集成服务,不断推进政府服务改革。近年来,郑州市发展迅速且效果显著,获得“国家中心城市”“新一线城市”“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杆城市”以及“亚洲城市50强”等头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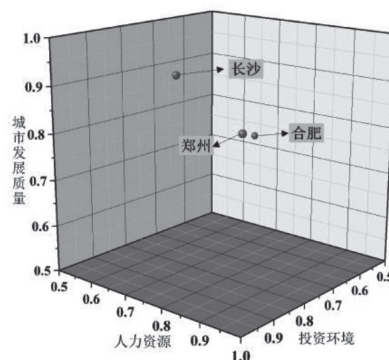
3.3.3 资源-政务主导型

路径H3指出,高基础资源和高政务环境作为核心条件,辅以高金融服务和高投资环境作为边缘条件的组态可以产生城市高质量发展。该组态表明,一些金融市场和投资市场相对较好的城市,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基础资源供给和政务服务改革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如图2(c)所示,处于此类营商环境生态的典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以北京为例,根据《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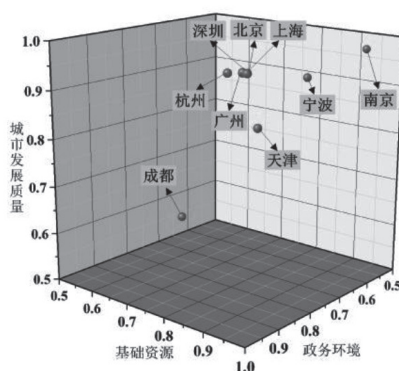
报告》,其在基础资源和政务环境两个方面的排名均位居第一。北京于2019年发布名为《北京市新一轮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任务的通知》的综合性文件,不断推进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设来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同年北京在营商环境各个领域发布相关改革意见,尤其在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等政务服务方面,获得电力、获得信贷等市场服务方面以及保护投资者等法律方面。在此营商环境生态下,北京市发展成绩名列前茅,荣获2019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第一。



(a) 条件组态H1



(b) 条件组态H2



(c) 条件组态H3

图2 条件组态解释案例

另外,为了更全面地探索城市发展的驱动机制,本文也分析了导致非高质量城市发展的4条组合路径。首先,路径L1a表明如果一个城市基础资源供给不足、金融行业不够发达、投资市场环境较差以及政务服务能力较低,其发展质量可能不会存在高水平;其次,路径L1b指出若一个城市忽视人才培养、资源供给、金融服务以及政务环境4个方面的建设,也可能导致城市的发展速度受缓且发展水平降低;再次,路径L2a说明一个城市劳动力市场欠缺、基础资源不充足、金融信贷不便捷以及投资环境不友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城市的发展质量;最后,路径L2b揭示假如一个城市仅仅依靠充足的基础资源,而不在人力市场、投资市场以及政务环境等方面下足功夫,也会造成城市发展质量降低。

从上述组态分析中,还可以得到一点结论,即在解释城市发展质量的组态中存在因果不对称性。将产生高质量城市发展的前因条件取“非”集之后,并不一定造成低质量城市发展。这说明,前因条件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因果非对称性。

3.4 稳健性检验

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也是QCA方法的关键步骤。稳健性检验有多种方式,一般通过改变相关参数设定,例如:调整校准方式、案例频数、一致性阈值等^[48],然后对调整后的数据再次进行分析,评估结果前后的变化以及其可靠性。参考主流方法^[49],本文通过改变一致性阈值的方式进行检验,具体做法为将一致性值从0.80调高至0.85。重新进行组态分析后产生的结果与原初一致,说明结论稳健。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针对营商环境如何促进城市发展的问題,本文创新性地利用组态思维和fsQCA方法,以36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从营商环境5个条件要素来探究影响城市发展质量差异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机制。通过研究,本文获得以下结论:(1)单一营商环境要素并不构成产生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低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2)高质量城市发展的驱动机制分为

3条路径,即人力-金融主导型、人力-投资主导型和资源-政务主导型;(3)低质量城市发展的驱动机制存在4条路径;(4)导致城市发展质量差异的原因存在一定的因果非对称性,即引起非高质量城市发展的路径并不全是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对立面。

4.2 政策建议

(1)系统优化营商环境生态。以往研究的焦点在于探讨单一营商环境要素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本文发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是营商环境各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在路径H1中,人力资源和金融服务发挥了核心作用,但仍需基础资源条件的存在才能推动城市发展质量的提高。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局部优化思维转变为系统协调思维,从整体的视角出发,统筹兼顾地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之间的协同融合,全面考虑营商环境生态的建设。

(2)重点建设生态核心要素。本文根据组态视角下核心条件的背后逻辑,提炼出3条驱动路径,启发各个城市应当着重发挥独有优势,在统筹兼顾中做到有的放矢,集中优势推动核心因素的发展作用。例如:长沙、合肥等基础资源供给不充足的城巿,地方政府应立足现有的政务服务基础,加强关键因素即人力资源和投资环境的建设,弥补城市在基础资源方面存在的短板,因此,城市需要深化整合各类发展资源,把握关键要素,高质量推动城市发展。

(3)因地制宜优化营商环境。在复杂系统视角下,本文发现城市的发展路径存在显著差异且侧重点不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在营商环境建设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广州依靠人力资源和金融服务的建设,深圳依靠基础资源和政务环境的建设来推动城市发展。然而相比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城市营商环境的建设存在一些难题,例如:兰州、银川等发展差距较大。因此,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利用自身“长板”优势,依靠“取其精华”弥补自身“短板”,进而推动城市发展质量的提高。同时也应形成预见性思维,根据目前发展情况做好前瞻性战略布局。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另外,本文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虽然组

态分析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得到对于结果变量有效的条件组合,但各条件变量的作用大小却不容易获悉;其次,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只选择了36个城市进行了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结论的

多样性和可推广性;最后,本研究只考虑了静态数据,没有考虑到时间的延展性,缺少营商环境对于城市发展影响的动态研究。若有可能,未来可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Simeon Djankov. Correspondence: The Doing Business Project: How It Started[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6, 30(1).
- [2] 宋林霖,何成祥. 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放管服改革的逻辑与推进路径——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04): 67-72.
- [3] 程金华.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之反思与“中国化”道路[J]. 探索与争鸣, 2021(08): 105-113+179+181.
- [4] Martins J, Veiga L. Electronic Government and the Ease of Doing Business[C]. Ireland: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 2018. 584-587.
- [5] Canare T. The Effect of Ease of Doing Business on Firm Creation [J]. Annals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18, 19(2): 558-584.
- [6] 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 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J]. 管理世界, 2012(04): 9-20.
- [7] Leal Rodríguez Antonio L., Sánchez Pedregosa Carlos. Could the Ease of Doing Business be considered a predictor of countries' Socio-Economic Wealth?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PLS-SEM[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9, 12(4): 229-243.
- [8] 罗斌元,陈艳霞. 数智化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J/OL].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224.G3.20211021.1726.008.html>.
- [9] 魏革军,张晓东,郝威亚,等. 万亿产值城市的经济发展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20, 42(05): 28-39.
- [10] J Estevo, JD Lopes, D Penela, Jm Soares. The Doing Business ranking and the GDP. A qualitative stud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0(115): 435-442.
- [11] 杨守德,宋美娟. 城市营商环境对流通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20(14): 30-33.
- [12] 张劲松,卢兆梅,詹圣泽,等. 营商环境优化与城市空间格局的提升——以厦门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20(10): 107-118.
- [13] 刘江会,黄国妍,鲍晓晔. 顶级“全球城市”营商环境的比较研究——基于SMILE指数的分析[J]. 学习与探索, 2019(08): 147-156.
- [14] 覃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城市发展转型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10): 111-116.
- [15] 黄海平. 新发展格局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J]. 浙江经济, 2021(01): 60-61.
- [16] 曾宪聚,严江兵,周南. 深圳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启示: 制度逻辑与制度融贯性的视角[J]. 经济体制改革, 2019(02): 5-12.
- [17] 朱巍,陈慧慧. 同一目标牵引下的不同发展路径研究——以城市专利创造为例[J].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19, 34(09): 50-57.
- [18] 张军,侯永志,刘培林,等.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J]. 管理世界, 2019, 35(07): 1-7.
- [19] 杨耀武,张平.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测度与治理[J]. 经济研究, 2021, 56(01): 26-42.
- [20] 欧进锋,许抄军,刘雨骐.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20, 40(06): 77-86.
- [21] 马海涛,徐植钤. 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评估与空间格局分异[J]. 经济地理, 2020, 40(04): 11-18.
- [22] 沈路,钞小静. 多要素流动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OL]. 科技进步与对策: 1-11[2022-10-0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224.G3.20220830.1517.002.html>.
- [23] 杜悦,陈晓红,刘艳军,等. 哈长城市群县(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力研究[J]. 经济地理, 2022, 42(08): 62-71.
- [24] Lee N, A Rodríguez-Pose. Innovation and spatial inequality in Europe and USA[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13(1): 1-22.
- [25] Oort F, Lambooy J G. Cities. Handbook of Regional Science[M].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 475-488.
- [26] 张国俊,王运喆,陈宇,等.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

- 特征及分异机理[J].地理研究,2022,41(08):2109-2124.
- [27] 崔丹,卜晓燕,徐祯,等. 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估及影响机理[J]. 地理学报, 2021,76(10):2489-2503.
- [28] 史丹,李鹏.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国际比较[J]. 东南学术, 2019(05):169-180.
- [29] 蒋硕亮,徐龙顺. 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放管服”改革的运行机制研究[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1, 23 (03): 127-139.
- [30] 王义强. 劳动力数量与企业的发展关系[J].人才资源开发, 2020 (2): 2.
- [31] 丁鼎,高强,李宪翔. 我国城市营商环境建设历程及评价——以36个省会城市、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为例[J]. 宏观经济管理, 2020(01): 55-66.
- [32] 谢守祥,田孟明. “双循环”格局下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沿海省份为例[J]. 商业经济研究, 2021(08): 180-183.
- [33] 潘霞,鞠晓峰. 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26 (14): 121-126.
- [34] 孙群力,陈海林. 我国地区营商环境的决定因素、影响效应和评价指数——基于MIMIC模型的研究[J]. 财政研究, 2020(06): 105-120.
- [35] 陈太义,王燕,赵晓松. 营商环境, 企业信心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2018年中国企业综合调查 (CEGS) 的经验证据[J]. 宏观质量研究, 2020, 8 (2): 19.
- [36] Shahbaz M, Solarin S A, Mahmood H.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duce CO2 Emissions in Malaysian Economy? A Time Series Analysis[J].Economic Modelling, 2013, 35 (5): 145-152.
- [37] 胡渊,杨勇. 财政支出、投资环境与FDI地区分布[J]. 宏观经济研究, 2021(09): 73-85.
- [38] 邓宏兵. 投资环境的作用与影响初步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0 (03): 353-356.
- [39] Dong-Hyeon Kim, Yi-Chen Wu, Shu-Chin Lin. Heterogeneity in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ize and governance on economic growth[J]. Economic Modelling, 2018, 68 (jan.): 205-216.
- [40] 袁文融,杨震宁. 营商环境如何影响居民创业——营商环境与软环境的异同[J]. 技术经济, 2021, 40(11): 35-45.
- [41] 张明,杜运周.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 定位、策略和方向[J]. 管理学报, 2019, 156(09): 1312-1323.
- [42] Atsushi Ishida, Miya Yonetani, Kenji Kosaka.Determinants of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Movements: An Analysis of Multiple Causation of LHRs Movements Using a Boolean Approach[J]. Social Forces, 2006(4): 1937-1955.
- [43] Rihoux B, Ragin C C.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M].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9. 1-17.
- [44] 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 2017(06): 155-167.
- [45] 马艳梅,吴玉鸣,吴柏钧.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基于熵值法和象限图法[J]. 经济地理, 2015, 35 (06): 47-53.
- [46] Ragin C.Set Relations in Social Research: Evaluating Their Consistency and Coverage[J].Political Analysis, 2006, 14 (3): 291-310.
- [47] 王英伟. 权威应援、资源整合与外压中和: 邻避抗争治理中政策工具的选择逻辑——基于(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20, 17(02): 27-39+166.
- [48] Krista B. Lewellyn.Income Inequality,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National Business Systems: A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J].Business & Society, 2018, 57(6): 1114-1149.
- [49] 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 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 ——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J].管理世界, 2020, 36(09): 141-155.